



城市布局与北齐文学的差异化发展和一体化趋向*

李德辉

摘要: 晋阳、邺都、洛阳是北齐的三个中心城市,这种多中心的城市布局给北齐文学发展带来两种趋向:一种,三地文学在风格上呈现出差异化发展情状,盛行于晋阳的霸府文学旨在服务军国大政,成长于邺都的台省文学以诗歌为主要样式,产生于洛阳的行役文学和怀古诗文以吊古兴悲为感情基调。另一种,三地文学在文体文风上相近,表现出一体化趋向。文体上,由重文轻诗转变为重视作文而又不忽视诗;诗风上,由各有旨趣转变为对情采和丽辞的普遍追求;审美上,由重实用转变为重感悟;写作手法上,由重写实转变为重抒情。差异化发展多为集体写作,一体化趋向则属个人创作,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北齐文学的基本面貌,并对隋唐文学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 北齐;文学;城市布局;差异化;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5)01-0045-10

文学是在特定生活场景中生成的,鉴于“特定生活场景”的重要地位,要深入探索一国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发展趋势,就得考察其组织实施的生活场景。古代有多个王朝,都存在首都、陪都“双中心”的政治体制,不同城市的职能分工就成为笔者的关注点。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更是文学发展的依托。中古文学家的主要活动场地是京城和陪都,中心城市生活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在南北朝表现得尤为突出。南北朝极少有官员迁谪、量移,也没有全面推行过科举、铨选、幕府制度,官员的主要聚集地在京城台省。但不同城市的地位有高下之分,同一城市在不同朝代的地位也有升降。如果把这些因素纳入,笔者发现,北齐不仅政治军事特殊,文学发展也特殊,它走的是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不仅地域有偏向,文体选择更有偏向。

一、北齐初城市布局调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北齐文学的发展与北齐初年的城市布局调整密切相关。北齐继承了北魏疆域的大部,辖境在今晋冀鲁豫及皖苏部分地区。由于北齐帝王的争霸战略,使得城市布局发生调整。首先将首都从洛阳迁到邺都,设置官署,安置百官,让这里成为政治中心;其次在晋阳设大丞相府,以掌握实权的权臣为大丞相,常住于此,裁决政务,称为霸府、霸朝、别都;最后将洛阳降格为废都,即使如此,洛阳仍是北方名城、交通枢纽,在政治、文化,尤其是文学上的地位仍不可替代。三地职能各有分工:晋阳处理军国要务,邺都作为政务中心,洛阳作为交通中心。城市定位不同,文学担当就不同。因此,从城市布局来审视

收稿日期:2024-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代文馆文献汇编”(21AZD134)。

作者简介:李德辉,男,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二级教授(湖南湘潭 411201),主要从事汉唐文学研究。

北齐文学,不失为有新意的视角。近年来,以空间形态为视角的成果渐多,但多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①。本文则以城市布局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为着眼点,为北齐文学研究提供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角度。

北齐城市布局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北齐的政权是开国皇帝高欢以晋阳为依托争抢过来的,所以建国之初,晋阳就成了争天下的第一要地。由于晋阳处四塞之地,相对中原居于上位,因而又变成守护江山的重要要地。尽管北齐初步完成了建国大业,但外族的威胁依旧没有解除,同时国内局势也不太平,聚集在洛阳的元魏残余势力蠢蠢欲动,居住在邺都的高齐王公也心怀不轨,因此晋阳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晋阳名为陪都,实则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要决策均由此发出。这势必影响到邺都、洛阳的地位升降。邺都名义上是首都,实则只承担一般政务。邺都远离边塞,又和北齐两大敌国——萧梁、鲜卑距离较远,是相对安全的城市,故而被北齐帝王当成留守之地,帝王离京之时,往往派遣重臣在此留守。如此,在政务上邺都和晋阳就有了轻重缓急之别。洛阳则随着东魏灭亡,北齐兴起,变成故都。尽管地位大降,但随着南北交往的增强,其交通都会的地位不降反升,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城市地位的升降势必影响到朝廷用人,在此过程中,朝廷会优先考虑最重要的晋阳,其次才是邺都,再次才是故都洛阳。《资治通鉴》卷一五八载:“东魏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崔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胡三省注:“史言高澄收拾人物以倾元氏。”^[1]可见高澄早在北魏末就开始布局。随着魏末齐初政治中心的迁移,人才遴选发生地域性变迁,其始于东魏末洛阳,北齐初迁移到晋阳、邺都。有鉴于北齐政治、文学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事实,因此不同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降,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人才的地域分布。北魏、北周和南朝都只有一个政治中心,没有在实力和地位上足以和首都相抗衡的城市。反观北齐,不仅有邺都、晋阳两京,而且陪都的地位反而要高过首都,这对北齐文

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多个王朝都存在“首都—陪都”双中心的政治体制,曹魏和唐代甚至还存在“五都”制,但陪都只是城市行政层次的抬升,政务其实仍集中在首都。唐东都、宋西都洛阳也只设置留台,处理不紧急事务。唯独北齐,将政务分散在晋阳、邺都两处,设置两套中枢机构^②。晋阳名为陪都,但北齐历代皇帝都在此裁决军国重务。皇帝即位前,常居此地霸府;即位后,又常住晋阳宫。霸府驻地并州,还有独立于邺都的政务机构——尚书省,史书简称“并省”。霸府、并省、晋阳宫三处,大小官僚数以百计。由于霸府和并省的重要性,北齐多数文人都曾供职晋阳,然后迁往他处。由于皇帝频繁巡幸两都,所以北齐文人都有从驾征行的经历。《北齐书·白建传》:“晋阳,国之下都,每年临幸,征诏差科,责成州郡。”^[2]⁵³³表明北齐帝王每年至少一次行幸晋阳。据《北齐书》本纪,神武帝高欢、文宣帝高洋在邺都、晋阳往返十余次,后主高纬行幸晋阳更多达二十余次,长住于此,邺都只是名义上的首都。

史籍载北齐史事,常有还邺、如邺、赴邺、迁邺、镇邺、留邺、留台、留镇、居守等字眼,具有鲜明的政治寓意,这表明北齐帝王把晋阳当成了王业的根本,而以邺都为留台,晋阳、邺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轻重有别的两都政治体制,晋阳代表的是新兴军阀势力,邺都则代表元魏旧势力,“邺与晋阳正好相当于其中的两个中心”^[3],东魏、北齐一直处于一种二重政权的状态中。东魏、北齐政权构成上的二元性,正是两都政治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这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晋阳是武将、谋臣的天下,邺都则是朝士、文人的天下,两股势力存在矛盾,很多事情都不相为谋。

北齐帝王的这种安排,造成了以晋阳为重,邺都、洛阳为轻的文学格局,带来了文学发展上的区域和文体分化,晋阳、邺都、洛阳的文学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作品内涵、体式上各取一端,差异性要大于同一性。这当然不是帝王的有意安排,而是在对中心城市调整中自然形成的一个“历史结果”,本质上是因朝代更迭、都城迁移而生。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未能一体

化的历史进程,而这个进程要到隋唐统一才结束。

二、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差异化发展

晋阳、邺都、洛阳在政治军事上定位的不同,使得三地文学形成了差异化格局,以下予以论述。

(一)晋阳的霸府文学

北齐的霸府文学是指孕育成长于晋阳霸府的文学,主要是服务于军国大政。晋阳是北齐对敌斗争前线,聚集的是有实干才能的文士。文士到此,主要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之职,或军府书记、记室、参军之任,日常工作是商议政务、写作公文,谓之“典机密”。此为一种政治、文学高度一体化的写作。北齐史书中,凡言典机密、掌机要的多指文士在晋阳议政、草诏,无此的则指一般诏令。《北齐书·文苑传序》表述上就分得很清楚:普通的除官诏旨交给中书郎按章写作,故而留在邺都中书省;唯有“军国文书及大诏诰”,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授人,故而交给并州霸府的诏敕高手写作,他们是大文章家,众望所归。温子昇、封绘、陈元康、杜弼、邢劭、高德政、魏收、祖珽、崔季舒、尉瑾、元文遥、赵彦深、卢潜、宋游道、宋士素、李广等就因文笔过人,长期在并州内省典机密,因而也是北齐文人中有文集传世的。《隋书·经籍志四》《旧唐书·经籍志》别集类,记载北齐有文集传世之人,和在晋阳典机密的文人名单高度重合,表明文人任职和文学创作呈正相关性。另外,凡依靠台省部门任职而留下文集的,都是些服务时政的应用作家,写出的是军府“文翰”,体裁是不押韵的各体散文,并不长于诗道。由于长期从事应用文书写作,忽视了技能锻炼,所以文学上成名的也少,有文集传世的作家仅十二位^[4],但在晋阳典过机要的却多达数十位。由此可见,取得了创作业绩的只占三分之一,实况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文学性虽弱,但符合北朝社会贵时用的文学观念,以此而常被时辈推许。

晋阳的霸府文学与邺都的台省文学呈现出

不同的面貌。晋阳文武官员颇多,但迫于形势,赋诗唱和始终未成风气。这里的军政府是霸府,府主是霸主,职员是霸才,从军政府到一般人员,全为兴王图霸而生,其文学样式自然只能是霸朝文笔。晋阳本是北魏重镇,北魏末军阀尔朱荣就是以此为基地掌控朝权的。高欢替代尔朱荣后,把他的那一套全盘继承,并加以发扬,所以晋阳在北齐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晋阳同时面临三大方向的压力:向北要抵御鲜卑入侵,向西要遏制宇文周攻击^③,向东要抵御萧梁北伐。此外,对内要防止邺都王公图谋叛乱。由此,北齐常年在此驻有重兵。由于晋阳重兵的存在,聚集在邺都的王侯,即便怀有异心也不敢轻举妄动。《北齐书·魏收传》:“时孝武猜忌神武,内有间隙,收遂以疾固辞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收曰:‘惧有晋阳之甲。’”^{[2]484}这番话很能说明这层关系。《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六确有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的记载,后人理解为外臣兴兵以清君侧,但考虑到北齐晋阳常驻重兵的情况,因而魏收这里并非用典,所以史书下文就有“神武南上,帝西入关”^{[2]484}的叙事,证实了魏收的担忧并非无据。

北齐这种将政治决策、一般政务分置于晋阳、邺都的格局,早在北魏末、东魏初就已露出端倪。那时,邺城是以孝静帝为中心的魏朝,晋阳是高欢父子的霸朝,两地不仅政治上对立,文学上也各有趋向。进入北齐,这一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强化,实权机构都在晋阳,各种诏命由此发出。出于建国大业的需要,有文誉的“写作高手”多被遴选至此,写作各体实用文。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有魏收、温子昇、李德林,此三人是北齐杰出文学家,但其才能不在诗歌,而在诏策、檄文、表疏。值得注意的是,邢劭、温子昇、魏收“北地三才”的称呼,是魏收在北齐初兼任中书舍人以后才有的,而温邢、邢魏齐名,也是在北齐中叶才出现的。这些文学并称的得名,都与魏、温、邢三人任职并州霸府,长于诰命、碑志有关。著名的檄文有魏收的《檄梁文》,重要的碑志有邢劭的《景明寺碑》《广平王碑文》等,当时就有广泛影响,唐初被收入著名文学类书《艺文类聚》、总集《文馆词林》,被士林推为典范。由于在北魏北齐,名寺碑和名臣碑

都是由皇帝指定专人撰写,故而北齐撰碑一事,性质也如同作诏。《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的李德林《霸朝集》三卷,就是这样的文章结集,以诏策、书檄为体。书檄因是秉承帝旨而作,所以实为诏敕的变体。《霸朝集》为李德林奉隋文帝命而编,《册府元龟》卷四〇载明,开皇五年(585年)敕内史令李德林撰集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意在为隋文帝施政提供参考。《隋书》中,此书前后,为《陈天嘉诏草》《皇朝诏集》,三者都是诏敕文汇编,其中《陈天嘉诏草》及《皇朝诏集》出自隋秘书省官员之手,是编撰的前代诏敕选集,说明《霸朝集》实乃李德林供职霸府时的诏敕总集。《隋书·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5]1198}这番话便很能道出这种文学的分量,其文体指向,正是“诏书移檄”二体。李德林在齐末周初号为“天上人”的惊人文誉,得自他在北齐晋阳霸府写的几篇征讨檄文。《隋书·李德林传》末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邺中,声飞关右。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5]1209}兼齐、周、隋三代而言之,表明他是北齐后期到周、隋最杰出诏敕作家,北朝继“北地三才”之后最优秀文章家。其自编的文集《霸朝集》显示出任职之地与文名、成就的关系,表明齐、周、隋三朝霸府是其获得文名之地,诏敕、军书是其创作成就所在。

聚集在晋阳霸府中的“馆客”也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依附权门,受到礼遇,称为“馆客”。这个词语,颇能表明他们以才艺而被任用的身份特征。人数多、分布广、职务重要,这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多部正史都有记载。其中《魏书·温子昇传》的元偃,是北齐文襄帝门下馆客。载于《北齐书》中的馆客属北齐的另有十多位^④。乃至武平四年(573年),开文林馆,征集学士入馆修书,首批入馆的萧愨、颜之推,“犹依霸朝,谓之馆客”,表明馆客是北朝对霸府文士的一般称谓。馆客都依附权门,富有才智,兼有门客、官员、文士三重身份。其中,有以文才见长的,如《郑元德传》中的郑元礼,年少时好学,有名望,

世宗引为馆客,历太子舍人,因有文藻而担任重要文职^⑤;也有以术数见长的,如《高德政传》中的宋景业、《北齐书》卷四九中的信都芳^⑥。无论以何种术业进身,霸朝和霸府都是其效命之地。

(二)邺都的台省文学

邺都的文学氛围与晋阳不同。这里是北齐中央政权所在地,由于有晋阳在西边作屏障,故而邺都局势平和、安稳,大批贵族官僚聚居于此,形成了一股弥漫全城的享乐氛围。北齐中后期,依托秘书省、史馆和文林馆三个中心,形成三个文士群体,主要创作场域是京城台省,因而以邺都为中心的文学,是台省文学和文馆文学的复合体,主要样式是诗歌。由于帝王发动,臣僚参与,在北齐后期,邺都文学发展出多个有特色的诗歌种类。

首先是乐府歌诗,人称“邺下新声”,是西域乐舞、中原乐曲、文人歌诗三者的组合。北齐帝王自文宣帝以后,都喜欢自西域传入的乐舞,并有这样的欣赏能力。由于帝王的爱好和提倡,不少西域乐工由魏入齐,或直接从西域进入邺下,制作歌曲、舞曲,胡乐胡舞在短时间内得以流行。文人则积极配合,撰写歌辞,文艺面貌为之一新。《北齐书·文苑传序》就此描述说:“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2]602}强调尽管同为变风变雅,但成长于邺下的文学样式是配合西域民族音乐歌唱的乐歌,梁朝乐府则是文人撰的徒诗,不合乐,不像西域歌舞那样触动人心。此外,此类诗作格调单一,多种曲调殊名一意,内容重复。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就此叙曰:“其后鼓吹乐府,新声起于邺中;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6]明言乐府经东汉初盛以后,在北齐首都邺下,又出现新品种,属于声诗,与之配合的为西域鼓吹乐,使世人耳目一新。齐末邺下的这种文学变风,特点是重视享乐,诗、乐、舞配合,所作为合乐曲辞,节奏感强,风格悲凉,有异域风情。这不仅和梁朝不同,与晋阳亦不同。

其次是君臣唱和诗文,产生于南北使节对接、聚会游乐场合。写作有特色的是接待梁陈交聘使节的宴会酬唱诗,诗中有陪同、酬唱、漳滨、至邺等字眼,证实了创作地点。如庾信《聘齐秋晚馆中饮酒诗》《将命至邺酬祖正员》《对宴

齐使》，裴纳之《奉使至邺馆》，裴让之《公馆燕酬南使徐陵诗》。书启方面，名篇有刘孝仪《北使还与永丰侯书》、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莫不感情真挚，辞采华美。此类制作虽多，但未能编辑成集，只被后世类书摘录，保存一二。载于《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的《文林馆诗府》八卷便是这样一部诗歌总集，作者是齐文林馆六十多位待诏。《旧唐书·经籍志下》作“《文林诗府》六卷，北齐后主作”^[7]。这么著录可能是有文献依据的，说明北齐后主高纬在文林馆中的关键地位。像这样的资料书，隋唐史志还著录多部，如《元嘉西池宴会诗集》《齐释奠会诗集》《文会诗集》，因而这也是一种南朝风气。这种文学内容上有独立性，写作上也宗旨不一，其发展并不能都归因于北齐皇帝，而应视为邺都君臣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显然不同于北魏和南朝以帝王为中心的御用文学。秘书省、史馆和文林馆，都是北齐的文馆。通过兴办文馆，多数才子都被召入邺都，成为以京城为基地的官僚作家。史馆、秘书省、文馆这三类文职机构在北朝中后期，成为宫廷文学创作的三大基地。这就与北魏不同，而和周、隋相似。

最后是无官方背景的个人写作，这类创作也不少见。《北齐书·文苑传序》盛称的“独擅其美”的散骑常侍王晞的诗文，就属于这个类型。其诗作于任职晋阳或邺都，官闲外出之时，写登山临水的见闻感受。其兄王昕，《北齐书·封孝琬传》称其为与邢劭年辈才位相近的“先达高才”。尝与阳固、裴伯茂、裴果、陆道暉等夜宿饮酒，赋诗数十首，由此可见其才情一斑。考虑到北齐文士多达数千，这类创作估计应该达到相当规模。

邺都、晋阳相距不远，官员往来频繁，在北齐中后期，形成邺都—晋阳文学轴心。据《北齐书·封孝琰传》，封孝琰前往晋阳典机密前，就在邺都任职，他是因才能而被抽调的。陈元康，天平初，在邺都修起居注，高祖闻而征为相府功曹参军，掌机密。杜弼，元象初，征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署记室事，转大行台郎中，后又引典掌机密，甚见信待。张亮以有才干，授丞相府参军事，渐见亲待，委以书记之任。以上三位都被从邺都调入晋阳。由于两京都有用人的需要，

因而几位传主，常年往来于两地。由于帝王在两京间来去不常，所以他们的行踪也变得没有规律，唯一相同的是随驾往返，不相分离。上述引文中的作檄文、典机密，就是他们的日常文事，尽管作品无多，却是政治化的文学，当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其价值与意义。

由于邺都、晋阳定位不同，文学种类、性质则不同，史书中对这两方面的记载，在遣词上就有明显差异。凡言在相府、霸府管机密的，都指晋阳。没有这种记载的，则在邺都，很多记载都可证实此点。《北齐书·魏收传》载皇建元年（560年），孝昭帝“别令阳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诏诰，收留在邺……司空主簿李翥，文词士也。闻而告人曰：‘诏诰悉归阳子烈，著作复遣祖孝征，文史顿失，恐魏公发背。’”^{[2]491}明言文士在晋阳的事务是草诏，在邺都的事务是修史，一文一史，分工明确。之所以会有此种差异，是因两地分工不同。晋阳为军国重地，皇帝身边需要有文士草诏。既然军国大事归晋阳，那么一般事务就只能归邺都了，因而留邺的都是普通政务。修史的秘书省、著作局正是这样的部门，因而史职在邺都。另外，史职事关褒贬，文职则事关军国，当然要比史职重要，所以文职之事归晋阳。《北史·樊逊传》：“于时魏收作《匡狄干碑序》，令孝谦为之铭……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河清初，为主书，参典诏策。”^{[8]2790}文中魏收撰名臣碑，樊逊代杨愔作书，属于一般文章写作，因而事归邺都。后面的“为主书”“典诏策”则事情重要，所以在晋阳。其时，两地才士多达三千，被录用的就有近三百，可以想见队伍之庞大。据《北齐书·徐之才传》，徐之才的任职和文学，就分散在洛阳、晋阳、邺都三地，表现也互异。《北齐书·元文遥传》：“孝昭摄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参军，典机密。及践祚，除中书侍郎，封永安县伯，参军国大事。”^{[2]504}前面典机密之地在晋阳大丞相府，后面除中书侍郎之地则在邺都中书省。《北齐书·崔劼传》：“转鸿胪卿，迁并省度支尚书，俄授京省。”^{[2]558}第一句鸿胪卿、第三句京省尚书是记其在邺都任职，第二句任度支尚书是记其在晋阳任职。《北齐书·祖珽传》：“文宣为并州刺史，署珽开府仓曹参军，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

疏之,一无遗失,大为僚类所赏。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珽皆和之,大为时人传咏……会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天保元年……参于晋阳……令直中书省,掌诏诰……在晋阳,通密启请诛琅邪王。”^[2]⁵¹³⁻⁵¹⁹引文所记祖珽撰诏敕、作碑志,事在晋阳,因君主在晋阳,臣僚的文学活动也不离此地。祖珽是北齐名臣,他的事例很有代表性,他的活动规律就是北齐文士的活动规律。北齐时,许多人都供职两都,其文学也分为抒情诗赋和纪事文章两个系统,这是北齐文官任职和创作的常态,其创作和任职地有相关性。

(三) 洛阳的怀古文学及文学传播

自东汉初到北魏末,洛阳一直是文学的中心。北魏初鲜卑崛起于代北后,从洛阳到建康的道路成为南北交通的第一要路。不仅如此,这条路还与洛阳和通南朝的驿路相连接,组成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这些因素保证了洛阳在北齐的重要性。东魏时,高欢以晋阳为基地,觉得建都洛阳不再安全,于是迁都邺下,洛阳的政治地位由此陡降。到孝敬帝天平初迁邺之时,洛阳就成为南北文士过路之地,无复往日之盛,怀古文学由此勃兴。洛阳崛起的标志,是北朝文学地理名著《洛阳伽蓝记》的问世。作者杨衒之在北魏亡国后行役至此。时北齐迁邺已十余年,他目睹这里宫室倾覆,寺观尽毁,庙塔变为丘墟,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因作此书。由于文笔过人,该书遂成为一部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9]作品。由于内容稀见,清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四库馆臣盛赞此书“体例绝为明析。其文秣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酈道元《水经注》肩随”^[10]。可以确认,东魏初的洛阳,文学上呈现衔接南北的过渡性特征,由此地可观察到文学中心从洛阳到邺下的迁移。这是因为东魏末及北齐前、中期的作家,都是从北魏过来的,青少年时期在此成名入仕,仕迹始于洛阳,终老之地则在邺都。大体而言,魏末齐初文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洛阳才有

这样的地位。

北齐代替东魏后,由于南北交聘的常态化开展,洛阳变成交聘使过路之地,各种纪行诗、旅行记由此而出,这是洛阳在当时文学中所起的另一个作用。出自北齐交聘使节之手的《江表行记》《封君义行记》《李谐行记》《魏聘使行记》《聘梁记》,及南朝文士撰的《述行记》《西聘记》《聘游记》《聘北道里记》《西聘道里记》《入关行记》,就以洛阳的古迹、名胜、人物、故事为重点,吊古兴悲是重要的感情基调,作者出使往返,都需要路过洛阳,南下、北上或西行入关。这里叙述的是以交聘为中心的纪实文学——行记的创作背景。诗歌方面,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有写到洛阳的交聘纪游怀古诗,《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也有记载。著述方面,融地理文学、历史文学于一体的书有不少。比如《洛阳宫殿簿》,就多次写到洛阳。初唐丘悦撰的著名杂史《三国典略》,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西魏,终北周,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二十卷。此书虽亡,但《太平御览》引用二百余条,三分之一引文记载的都是北齐邺都、洛阳的公卿、王侯、文士事迹,均为正史所不载,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史传文学著作。这些书籍的产生,有力地证实了洛阳在北齐文学空间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魏孝文帝太和中起,南北双方就休战讲和,“使命岁通”。到北齐中后期,更形成遣使交聘的高峰。《册府元龟》卷六五四《奉使部》载北齐与梁、陈交聘多达数十次,在北朝次数最多,人才也最盛。北齐赵郡还出现过以出使南朝而闻名的盛门。李浑、李湛、李绘、李伟父子兄弟四人,都出使过梁陈,赵郡人士称之为“四使之门”。为了显示本国文化的优越和人才的出众,南北双方对遣使交聘一事格外重视。北朝每次都要“妙简行人”,史云:“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8]¹⁶⁰⁴而南朝也深谙此理,每次遣使都要精选才士,在交聘场合针锋相对。由于这样的政策导向,每年在洛阳一带,都可看到南北交聘,“使者相属”的现象,记述交聘经历见闻的专书、专文和诗歌,由此勃兴。洛阳位于四方通

衢之地,又是北方最著名的城市,在文士心目中地位很高,过境之际,必然以此为重点。从散见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中的南北聘使行记及诗赋佚文看,只要是写南北交聘的,十之七八必写对方境内风物。洛阳到邺都一线,为华夏文明之中心,古迹、异闻最多,尤为记述的重点,可见是地理位置保证了洛阳在文学上地位不减。

南北诗文与图书传播也以洛阳为中介。北朝通过洛阳到江左驿路来维系和梁、陈的联系,来自江南的使节、商旅、图书,都由此路北。北方人士要接触先进的南朝文化,主要的地点也在洛阳、邺都。因而邺都至洛阳驿路在文学上的又一功用,是实现南北文风的交汇对接。《北齐书·元文遥传》:“敏慧夙成,济阴王暉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劭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济阴王曰:‘我家千里驹,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来未有。’”^{[2]503}《隋书·经籍志序》:“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5]907-908}以上两例,都是写南朝文集、图书,通过洛阳至建康驿路,经由南北交聘使节、商客之手北传,邺都是文献传递的终点,洛阳则是中转站,这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这表明洛阳虽为废都,但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可以连接东西,沟通南北,故仍是北齐文学版图的重要一环。洛阳在文学传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

三、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一体化趋向

文学发展的差异化意味着多元化,但离开一体化来谈多元化是主观的、片面的,事实上,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从大局看,一体化不仅不会对多元化构成阻力,还能产生推力,这是因为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虽各有偏重,但人员调动是在一体化的政治格局中实施的。如此一来,三地的人才就是流转互动的,文风也会带来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相反的

趋势,由差异化朝着一体化方向迈进。文体上,由重文轻诗转变为重视文而又不忽视诗;诗风上,由各有旨趣转变为对情采和丽辞的普遍追求;审美上,由重实用转变为重感悟;写作手法上,由重写实转变为重抒情。这些转变虽然起初并不明显,但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周书·苏绰传》谈到,从晋末起,文章就竞为浮华,到北齐、北周,遂成风俗。《周书·柳庆传》载明,这种文风传导路线是江左—洛阳—关陇,洛阳、邺都一带的后进青年,对于这种南朝文风,十分倾慕,祖述不已,表明靡丽文风并未因为北齐实行的军国政治及由此带来的城市分工而间断,仍在持续发展。《隋书·李谔传》进一步指出,这种文风的具体表现,是风云月露,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5]1544},在吟咏情性的五言诗方面下很深的功夫,通过熟读前人文集、类书,切磋讨论,得到技巧能力的提高。这种趋向,越到后来越明显,周、隋之际,中原、关陇“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5]1544},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表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从官方到民间都很强烈,构成一股强大的否定性力量,让北齐文学脱实向虚,朝着抒情艺术方向发展,同时反过来对各体公文写作形成浸润,致使文表华艳,屡禁不止,以至隋文帝不得不于开皇四年(58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5]1545},然而收效甚微。

这表明北齐文学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并不是全面覆盖的,也印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即任何对立的事物都有统一的一面,不仅其内部存在着否定性因素,而且在内外合力作用下,还会向着相反的一面转化。北齐文学同样不能例外,分裂和互异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统一和一体才是大势所趋。北齐文学在此三地的差异化发展,只是一段时间内维持的暂时现象,而随着国家政治军事形势的改变,必然会朝统一的方向发展。从根源上说,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差异化发展,乃是权力运作使然,出自帝王的制度安排,体现出皇权对文学的规导,其作用范围和有效性是有限的,其对个人写作的影响就很小。在个人写作方面,北齐恰恰留有较大空间,因为北齐文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此三地,而这三地在区域文化上各有

特点,能够对文人产生不同影响,使其诗歌、散文的题材、主题与地域文化保持一致性。此三地作为一个稳定的交通架构,引导文人在它们之间往复调动,保持人才的有序流动,这样反而利于文学发展。而北齐文人的仕历也并未限于一地,而是根据需要,在此三地调动,这就为北齐文学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动力——以官员在不同城市的职位迁转为基础,通过人才的自由流动,形成文学的有序展开,让文学家接触到不同的风土人情,这样可以弥补其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偏颇,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所以在北齐中后期,此三地都出现了风格、题材相似的诗歌,都有以五言诗为体的山水诗、隐逸诗。不仅如此,山水和隐逸两类题材还存在合流互渗的倾向,很多时候,山水诗的题材表现的却是隐逸的主题,文体及题材大体一致。偏重诗歌创作的倾向在开始的时候还不普遍,积累到一定程度,诗歌就盖过文章,成为一种新趋势,从而和隋唐文学接近。笔者注意到,北齐、北周灭亡以后,经过隋代的短期统一,从前那种诗歌为文章所掩,始终声势不振的低伏状态就此终结,到唐玄宗开元中,“诗的国度”“诗的唐朝”就已变成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这场文变,历时不过百年,而其关键就是国家由分到合,文体文风必然随之调整。

晋阳、邺都、洛阳都有规模庞大的文人群体,又都有山水之胜,只是美感不同。文人无论到哪一处,都会性悦山水,公事之余,聚会、宴游等活动随之而至;若逢乱世,则会至近处山中隐居自乐,从而又为隐逸诗文创作提供机会。邺都附近有太行、恒山等名山,自古多隐逸之士。而晋阳周围也多大山,为宜居之地。洛阳虽在中部平原区,却为四塞之地,自古就是文人寻求山水之乐的理想场地,所以这里早在魏、齐易代之际,就成为文人游乐隐逸之地。例如杨愔,北魏正光中,“随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晋阳西悬瓮山读书……以世故未夷,志在潜退,乃谢病,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劭隐于嵩山”^{[2]454}。其读书、隐居之山,就在晋阳、洛阳近处。邢劭“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2]475}。王晞,北魏末在洛阳入仕,后又在邺都、晋阳任王府文学侍

从。由于他性情闲雅,喜爱山水,长于吟咏,所以在此三地都留下了登山临水之诗,并以此而获得清美的文誉。《北齐书·王昕传》:“言必诣理,吟咏情性,往往丽绝……仍属迁邺。遨游巩洛,悦其山水,与范阳卢元明、巨鹿魏季景结侣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终焉之志……武平初,迁大鸿胪……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闾,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物外司马。常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2]417-422}又载,昕亦喜爱吟咏,文宣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病不至。帝遣骑执之,见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2]416-417}。表明无论位居何职,身在何处,都不忘赋诗写景,寄托情志。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但也不是特例,实为一个由来久远的文学传统^⑦。北齐不少文人都喜爱吟咏,只是水平不高。《北齐书·郑述祖传》:“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魏收……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谓思道云:‘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2]398}《北齐书·古道子传》:“荀仲举、萧愨工于诗咏。愨曾秋夜赋诗,其两句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为知音所赏。”^{[2]628}《北齐书·孙灵晖传》:“子万寿,聪识机警……有辞藻,尤甚诗咏。”^{[2]596}《北齐书·刘逖传》:“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2]615}所记事例,在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此三地各有文士数百,都有游乐、聚会、宴谈的风气。前引《北齐书·刘逖传》载明,晋阳霸朝,用人甚多,人才荟萃,士人游乐风气浓厚。自古游乐和诗文相连,活动期间,必然有文学创作和评论相伴随,这对培养士人的文学批评鉴赏能力、提高理论素养和创作水平有好处。相比之下,邺都的生活更安逸,政治、外交活动更频繁,赋诗的场合更多。每逢节日喜庆或是外国使节来访,朝士都要应诏赋诗,同题共咏,以见高下。天保十年(559年)文宣帝驾崩,即令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善者用之。刘逖不长诗道,仅得二首;魏收、阳休之、祖孝征诗才有限,每人才得三四首;唯杨遵彦、卢思道,诗才杰出,各得八首,事载《北史·刘逖传》《隋书·卢思道传》。这还只是其中一次,北齐中后期这样的活动并

不少,而且带有政治寓意,政治和文学被捆绑在一起,虽不为文学而备,却能促进文学发展,种种原因,使得北齐后期的邺都变成一个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中心,诗歌创作在这里率先发展起来,并对其他城市文风产生影响。

洛阳自东汉以来,就是北方文士隐居的中心,又是多个朝代的国都,故而早在东魏初,就有赋诗游乐风气。据《北史·邢劭传》载,北魏末,邢劭年轻时,有数年都在洛阳游乐,单一次在北海王元昕王府宿饮,就赋诗数十首,诗稿遗落在主人家。进入北齐,洛阳虽然官府迁移,盛况不再,但多有隐士,又富山水,故而也不乏诗咏。洛阳是北方交通枢纽,交通线通往关陇、河北、江左,邺都则是南北交聘的终点,来自南朝的人员、物资、图书,通过驿路传递到北方。北方本来就图书稀缺,南朝名家别集、类书、总集、史籍、子书,在北朝图书市场成为紧俏产品。交通、贸易的便利,又为邺都、洛阳、晋阳的文士学习南朝文学提供了便利,因而此三地文学成长较快,在较短时间内,就向南朝文学靠近。例如邢劭,北魏末,因尔朱兆入洛,京师扰乱,与弘农杨愔避地嵩山,普泰中才入仕,表明三地都有宴会、游乐趋向,王晞和萧愨的写景诗就成长于这一环境之中,并有“丽绝”的美名。而“丽绝”还不止是一种文誉,就北齐文学而言,还是一种新的审美趋向。萧愨的诗还得到过北朝文学名家颜之推的赞扬,载入《颜氏家训·文章》,赞其“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1],赋物而达到了神情萧散、宛然在目的境地,表明其情与景做到了交融互渗,是进步的表现,也是努力的方向。萧愨其人其诗,亦见《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三国典略》,对于此事有细节的补充。晚唐著名文学家皮日休《郢州孟亭记》还特地举出萧愨此联,以为北齐的诗章之美,并举出盛唐诗人孟浩然写秋景的名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相对比,从中可见其造句、构境的成就之高,表明以佳句配丽景,乃是北齐文士共同的审美趋向,说明其对以五言诗的写景抒情艺术怀有强烈兴趣,所以才会屡有这方面的创作尝试。据《北齐书·文苑传》及《太平御览》卷九〇一,天保中萧愨入齐,武平中官

至太子洗马。此诗作于北齐后主时,故能为朝士所知所赏。

结 语

综上所述,北齐多中心的城市布局对其文学发展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带来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分化,使其在文体文风上各有偏向,影响到士人创作才能和文体偏好,多数人写得较好的是诏诰、军书、笺表、碑志,在后主高纬即位以后才风气略变,但也只是一时之事,因而并未改变北齐重文轻诗、重实用轻抒情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南北交往加深,加之三地地域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学自身的进化,文人对诗美的追求日益强烈,推动北齐文学朝着吟诗写景的方向转化,表现出体性清虚的艺术特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十卷,载八十四人,多数文章作于晋阳、邺都、洛阳^②,但他们也留有诗作。如邢劭,少年时在洛阳,游宴赋诗;文宣帝时,从幸晋阳;帝驾崩,敕撰哀策。邢劭的创作就无地域分别,地域对其文学创作并未带来限制,不仅如此,辗转多地还为其诗文创作带来生机。放眼北齐,不止邢劭如此,其他文士亦然。例如李铉,年少时游邺都;武定中,在晋阳,师友诸王;显祖受禅,从驾还邺都。张雕,先在邺京任职,后从世宗赴并州;天保中,被召还邺。高德政,在晋阳入仕;迁黄门侍郎,还邺都;世宗嗣业,至晋阳;后还邺京,参掌机密。阳休之,天平中,达邺都,奉高祖命,赴晋阳;武定中,除中书侍郎,还邺都;后奉玺书,诣并州;显祖受魏禅,自晋阳使还;两地相较,在晋阳的时间反而更长。上述诸人的创作,多以文章为主,但也不无诗歌。虽然迁转频繁,但基本规律是跟随帝王,两京往返,很少到地方任职,与其他朝代相异。由于晋阳、邺都人才过于集中,一般城市的文学就发展不起来,可见城市布局有时能对一国文学发展起到决定作用。

注释

①此类研究如梅新林的文学地图研究,李志艳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等。②此类问题,崔彦华的《“邺—晋阳”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有较为详细确切的论述,但该

文毕竟是解决史学问题的史学论文,文学方面并无深入的论述。参见崔彦华:《“邺—晋阳”两都体制与东魏北齐政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③王仲萃:《魏晋南北朝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87—592页。④其中卷四《文宣帝纪》有文宣帝馆客王昙首,卷三八有辛术、宋游道、李绘,卷四三有李稚廉,卷四四有崔亮,都被北齐帝王迎为馆客,待以上宾。参见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⑤⑥李百药:《北齐书》,卷二九、卷三〇。⑦雷炳锋:《北朝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24—176页。⑧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823页。

参考文献

-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901.
[2]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3]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4.
[4]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12-618.
[5]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李云逸.卢照邻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339.
[7]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0.
[8]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7.
[10]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619.
[11]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75.

The Effect of Urban Layout on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Trend of Literature in Northern Qi Dynasty

Li Dehui

Abstract: Jinyang, Yedu, and Luoyang were the three central cities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forming a multi-centered urban layout that brought two tendenc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Northern Qi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three regions presented a differentiated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In Jinyang, military literature thrived, aiming to serve the need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while in Yedu, ministerial literature emerged by taking poetry as its main style. Meanwhile, Luoyang saw the rise of travel literature and nostalgic poetry, which mainly mourning for the pa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three places is similar in style, showing a trend of integration. In literary form, there was a shift from valuing prose over poetry to an appreciation for both, with prose remaining significant while poetry gained importance. In poetic style, literature transitioned from having distinct purposes to the universal pursuit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gorgeous language. Aesthetically, there was a shift from valuing practicality to emotional insight. In writing techniques, the emphasis was changed from realism to lyricism. Among them,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mostly exists in collective writing, while the integration trend is mostly seen in individual works. Thes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form the basis of Northern Qi literature, exerting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i and Tang literature.

Key words: Northern Qi Dynasty; literary; urban layout; differentiation;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周舟]